

□悦迪

### 全人类共有的文明馈赠

在普通人眼里,世界遗产或许是长城的蜿蜒、故宫的恢弘,是泰山的雄奇、西湖的温婉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则这样诠释世界遗产的价值:“世界遗产是先人留给后世的宝贵馈赠,它不仅是现代人生活的文化载体与自然环境基础,更是我们计划传承给未来世代的珍贵财富。文化和自然遗产,作为我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,持续激发着无尽的灵感与创造力。”

世界遗产最独特的魅力,在于它的全球性视野。它超越了国界与领土的界限,是全人类的共同财产,构建起“人类共居地球、共享资源”的全球共同体理念。无论身处何方,我们都应对这份遗产怀有敬畏之心,扛起保护的责任。其实,对世界遗产的重视与保护意识,早在《世界遗产公约》正式出台前就已在全球萌芽。人们渐渐意识到,那些承载着人类共同记忆的珍贵遗存,需要国际社会携手守护。

1960年,埃及政府面临一个两难抉择:修建阿斯旺水坝可以解决国家的水资源短缺和电力紧张问题,但大坝蓄水后,尼罗河上游努比亚地区的大片土地将被淹没,阿布辛贝神庙、菲莱神庙等一批珍贵的古代遗产也将长眠水底。危急时刻,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出倡议,一场跨越国界的遗产保护行动就此展开。

到了20世纪70年代,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遗产保护脚步进一步加快。在巴基斯坦,组织对公元前3000年的摩亨佐·达罗考古遗址进行了抢救性保护;在印度尼西亚,对婆罗浮屠佛教遗址的修复工作也顺利推进。

彼时,人类社会正经历着经济高速发展阶段,但生态破坏、能源短缺、环境恶化等问题也随之而来。《千山万水》一书指出,正是这些早期的跨国保护实践,以及人类面临的共同环境挑战,为1972年《世界遗产公约》的诞生奠定了基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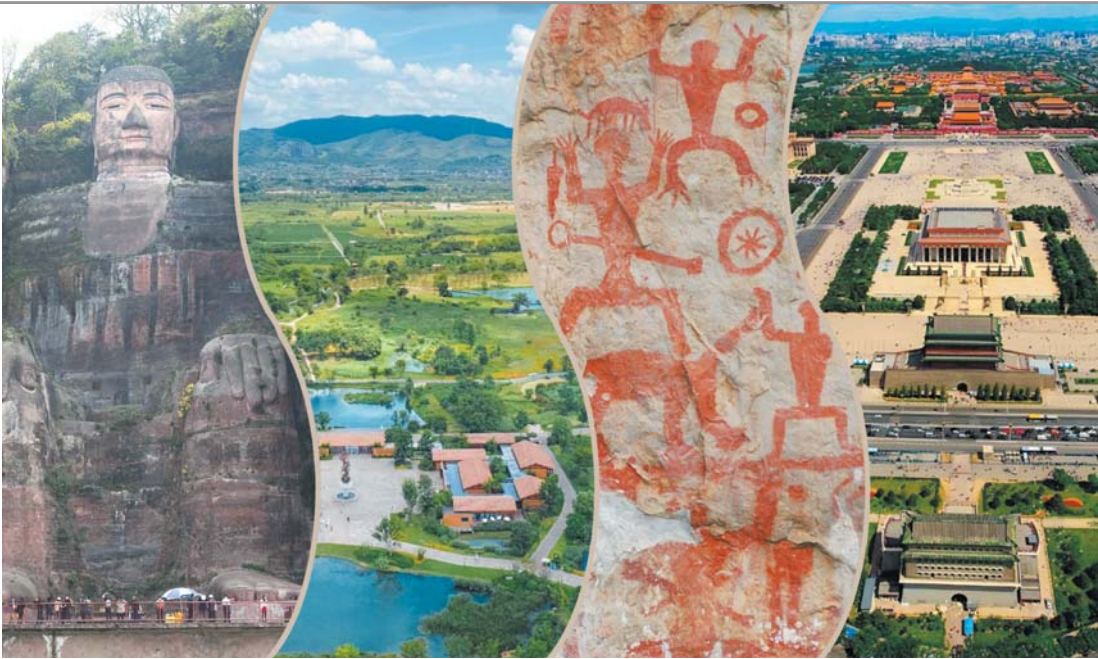
要成为世界遗产,并非一件容易的事。从《世界遗产公约》的定义来看,遗产主要分为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两大类,后来又增加了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这一类别。

项目要想成功入选《世界遗产名录》,必须满足一系列严格的条件。首先,要符合世界遗产的十条评定标准中的至少一条。这十条标准涵盖了文化、历史、艺术、科学、生态等多个维度,比如体现人类创造力的杰作、反映人类历史重要阶段的建筑或遗址、与重大历史事件或传统信仰相关的场所、具有独特生态价值的自然区域等。除了符合评定标准,申报项目还必须满足三个基本要求:真实性、完整性和良好的保护状况。同时,申报方还需要对同类遗产进行比较研究,证明项目具有独特性。

当然,如果某遗产对象具备高度价值与真实性、完整性,但保护状况堪忧,如因地震等自然灾害遭受严重破坏、面临毁灭性威胁,可依据紧急程序直接列入《濒危世界遗产名录》。例如,伊朗的巴姆古城在地震后损毁严重,便作为紧急项目被列入名录,并获得了世界遗产基金的资助,以支持其逐步恢复与保护。

### 申遗之路并不平坦

1985年,中国正式加入《世界遗



# 中国申遗四十载 千山万水踏歌行

如果将加入《世界遗产公约》视为中国开始参与世界遗产的申报工作,今年恰逢中国申遗40周年。这条道路,从来不是坦途。正如《千山万水:中国申遗故事》一书所述,那些鲜为人知的背后故事,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坚守与探索。从首批申遗时的小心翼翼、反复磨合,到如今以自信姿态参与世界遗产事务,这40年,是中国不断读懂国际规则、打破文化隔阂的40年,更是将中国的遗产保护理念与实践推向世界的40年。



在鼓浪屿,台风过后,倒伏的树木通过艺术装置的形式留在原位,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向公众继续传递着故事。(郭语涵 摄)

产公约》,这标志着中国的遗产保护事业融入全球体系,也开启了中国申遗的漫漫征程。

1987年,中国迎来了申遗史上的第一个丰收年。长城、故宫、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、泰山、敦煌莫高窟、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六项遗产成功入选。这六项遗产,无疑是当时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杰出代表。但鲜为人知的是,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,中国学界对于“要不要申遗”“申遗有什么意义”等问题,曾展开过激烈的讨论,存在巨大分歧。

殷墟的历程,堪称中国申遗路上的一个生动缩影。从1998年学界开始关注殷墟申遗,到2006年成功入选,8年时间里,无数人付出了艰辛的努力。为了梳理殷墟的价值,考古工作者深入发掘,证明殷墟的历史地位;为了保护遗址整体风貌,当地政府开展大规模拆迁整治工作,将遗址范围内的居民和企业有序迁出;为了让世界更好地了解殷墟,工作人员创新展示形式,提出“大地博物馆”的理念。一系列扎实的

工作和双向的磨合,打动了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专家,最终让殷墟成功跻身世界遗产名录。

中国申遗之初,面临的不仅是价值认知上的挑战,还有保护理念上的差异,就连长城的申遗之路都充满了波折。由于长城绵延万里,范围之广、规模之大,在世界上都罕见,世界遗产委员会此前从未遇到过这样的申报项目。相关部门不仅要大量解释工作,让国际专家理解长城的独特价值,还要花费巨大精力撰写申遗材料,详细阐述长城的历史沿革、保护状况等内容,最终才让长城顺利入选。

木构建筑的保护则是另一个典型案例。在中国,修缮古建筑时更换腐朽的木料,修补受损的结构,是延续建筑生命的常用方式。但西方专家对此难以理解,他们认为这样的修缮会破坏遗产的“真实性”,违背了世界遗产保护的原则。为了消除这种误解,中国文物专家要经常远赴世界遗产大会,用详实的案例和耐心的讲解,一遍遍向国际专家解释:中国古建筑的“修”,不是破坏,而是守护。更换腐朽木

料,是为了防止建筑坍塌,让它能够继续屹立;修补受损结构,是为了保留建筑上的历史信息,让这些

信息能够传承下去。经过多年的努力,国际社会终于理解并认可了中国的木构建筑保护理念,这也成为中国遗产保护理念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。

《千山万水》还提到,中国的遗产类型极为多元,涵盖了建筑奇迹、宗教艺术、水利工程等诸多领域,许多承载着东方文化内涵的“活化石”,都曾因地域阻隔和文化差异,难以被国际社会充分知晓。比如登封“天地之中”历史建筑群,汇集了少林寺、中岳庙、嵩阳书院等众多古建筑,体现了中国古人“天地之中”的宇宙观和“天人合一”的哲学思想。但国际专家对这种独特的文化理念并不熟悉,为了让他们理解,工作人员从中国传统文化入手,详细解读“天地之中”理念的起源和发展,以及这些古建筑如何体现这一理念,最终让项目成功申遗。

天灾人祸,同样考验着中国的申遗团队。2017年申遗成功的鼓浪屿,在前一年国际专家现场考察期间,遭遇了超强台风莫兰蒂的袭击。应对台风灾害过程中,大量的社区居民志愿者、驻岛机构工作人员、商家店主等在第一时间加入灾后重建。考察过程中,国际专家不仅看到了鼓浪屿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,更被岛上居民对遗产的热爱和团结协作的精神所打动,评价鼓浪屿是“全球公民精神的重要课堂”。

### 串联起的中华文明之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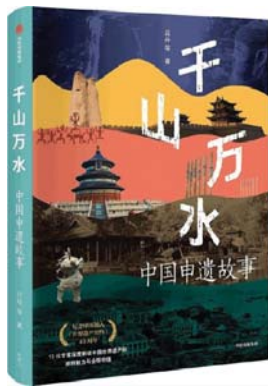
在中国的世界遗产名录和预备名录上,一个个遗产项目如同珍珠般串联起来,勾勒出一条跨越时空的历史轴线,展现着中华文明的绵延不绝与博大精深。

从旧石器时代的周口店北京人遗址,到新石器时代的良渚遗址、红山文化的牛河梁遗址等,共同描绘了一幅史前文明“满天星斗”的璀璨画卷。殷墟展现夏、商、周三代中商代的文化特征,秦始皇陵则反映了中国进入统一王朝时代壮阔的历史过程。丝绸之路与长城等项目,勾勒了自汉代一直延续到明代的文化交融长卷。南北朝至隋唐的云冈石窟、龙门石窟及敦煌莫高窟等,不仅展现了佛教艺术的东渐与本土化过程,也见证了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。宋、元、明、清各代,从宋代的大足石刻到元代的元上都遗址,再到明清时期的北京中轴线及十三陵等,均以其独特的魅力丰富了世界遗产的宝库。近代以来,如澳门历史城区、鼓浪屿:历史国际社区等遗产的加入,更为讲述中国近现代史提供了宝贵素材。

在《千山万水》看来,世界遗产不仅是中国历史的见证者,更是中国文化多样性的生动体现。三孔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,五台山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,青城山、武当山则是道教文化的圣地,它们共同展现了儒、释、道三种文化在中国社会中的和谐共存。承德避暑山庄不仅是皇家园林,更是清代处理民族关系、维护国家统一的重要场所,体现了清代“怀柔远人”的治国智慧。皖南村落、平遥古城、福建土楼、开平碉楼等,则以其独特的地域文化和建筑风格,展现了中国地方文化的丰富多样性:皖南村落的白墙黛瓦、小桥流水,是江南水乡文化的缩影;平遥古城完整保留了明清时期的县城格局,是中国古代城市的“活化石”;福建土楼以奇特的圆形建筑形式,体现了客家人聚族而居、防御外敌的生活智慧;开平碉楼则是近代侨乡文化的见证,融合了中西方建筑风格。

还有一些遗产项目,以其特殊的概念意义,丰富了世界遗产体系的内涵。登封“天地之中”历史建筑群,表达了中国古人对宇宙秩序和天人合一理念的理解,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宇宙观的生动体现;土司遗址的申报成功,填补了世界遗产体系中关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土司制度的空白;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,以壮观的岩画群和独特的艺术风格,展现了古代骆越人的精神世界和社会生活,为世界岩石艺术增添了新的类型。

可见,中国的申遗之路,不仅是将一个个遗产项目推向世界的过程,更是中国不断学习、不断成长,与世界文明对话交流的过程。未来,随着更多中国遗产项目走向世界,相信会有更多人读懂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,感受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,而中国也将以更开放、更自信的姿态,为世界遗产保护事业贡献智慧和力量。



《千山万水:中国申遗故事》  
吕舟 等著  
大方 | 中信出版集团